

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及其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影响

孔 亮

摘要：俾路支民族主义接近族裔民族主义，具有极端化的潜质。长期以来，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在政治上缺乏话语权，经济上贫穷落后，文化上受“萨达尔”制度的影响而封闭、守旧。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俾路支民族主义逐渐极端化，表现为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其他民族利益的“民族利己主义”、拒绝外来民族和文化的“民族排外主义”以及割断历史、文化联系以谋求独立的“民族分离主义”。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产生了消极影响：俾路支利己主义者将该省的资源和经济走廊项目视为民族私产，追求俾路支人利益的最大化，不顾走廊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片面强调公平，影响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俾路支排外主义者认为外族人参与俾路支省的经济开发会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危害俾路支人的利益、身份认同和文化传统，因而破坏经济走廊形象，降低了当地社会对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的参与程度；俾路支分离主义者将经济走廊视为掠夺俾路支省资源的阴谋，频繁发动针对经济走廊项目和中国人的恐怖袭击，威胁着经济走廊的安全。

关键词：民族主义；巴基斯坦；俾路支人；极端化；中巴经济走廊

收稿日期：2021-01-10

作者简介：孔亮（1988~），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南亚政治、历史。

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对中巴经济走廊而言意义重大：瓜达尔港运营和自由区建设项目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旗舰项目，在中巴经济走廊“1+4”合作布局中被列为四大重点之一；走廊西线的重要节点多位于俾路支省，除瓜达尔外，还包括图尔伯德、旁吉古尔、纳格、巴斯玛、索拉巴、卡拉特、奎塔、基拉赛福拉、佐布等。然而，中巴经济走廊在俾路支省的建设却并不顺利，面临舆论批评、游行阻

挠和恐怖袭击威胁等问题。尽管诱发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各不相同，但其背后都有俾路支民族主义势力，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子。可以说，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已经成为中巴经济走廊不得不面对的一大挑战。

一、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

俾路支人是巴基斯坦主要民族之一，主要居于俾路支省，部分居于信德省西北部、开普省南部和旁遮普省西南部。历史上，俾路支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19世纪末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泛俾路支主义思想运动，史称“达坎运动”（Darkhani movement）。^①20世纪20年代以后，俾路支人的集体主义思想一步步觉醒，并上升为要求构建俾路支国家的政治理想，但这一政治诉求与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相矛盾，导致了1947~1948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俾路支人的地方保护情绪因而达到了顶峰，民族主义思想正式形成。^②

（一）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潜质

学者们通常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两种理想类型。前者把民族的诉求建立在对一整套相信代表着正义和有效的政治信念与制度的忠诚上；后者将民族的合法性建立在共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共享的历史经验和（或）共同亲人的神话上。^③事实上，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公民或纯粹族裔的。任何民族都可以放在介于公民民族和族裔民族的共同体内进行考察，其所处位置偏向公民还是族裔则主要依靠成员效忠以及民族内部融合时依据的是制度还是文化来判断。从这一点来说，俾路支人更接近于族裔民族，其形成主要依赖文化资源，如俾路支语、历史性自我身份认同、对卡拉特汗国的共同记忆等，及其在社会动员中的广泛运用。

族裔民族是主观构建的产物，是由文化资源，如族裔历史、语言、宗教、风俗等驱动，进而形成的一个积极的、政治化的“民族”。^④这样的民族是以共同文化遗产为核心形成的，族裔文化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扩散，有助于其阶层统一。当其文化遗产和传统面临威胁时，族裔纽带往往更加强大和排他，进入的壁垒也更高。因此，无论是对内激励、净化民族成员，还是对外反抗压迫者和政权竞争者，俾路支人都展现出了强烈的大众性族裔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将国家

① 钱雪梅：《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世界民族》，2013年第3期，第21页。

② 张元：《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1页。

③ 杰克·斯奈德著，吴强译：《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5页。

④ 安东尼·D.史密斯著，王娟译：《民族认同》，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153页。

与民族间的差别置于焦点位置，以文化的名义对民族成员进行动员，认为其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遭到了埋没和忽视，且在国家的强力压制下面临灭绝的威胁，而这种国家通常是为主体民族及其精英服务的。

在巴基斯坦，旁遮普人是主体民族，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拥有最大话语权，国家的各类资源都向旁遮普人倾斜，国族文化也主要体现旁遮普人的文化特征，例如巴基斯坦的国服就是基于旁遮普人的传统服饰确定下来的。另一方面，巴基斯坦的主要民族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俾路支人由于数量最少，在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以俾路支语为例，尽管它是大部分俾路支人使用的语言，但却不是俾路支省的官方语言，而且在城市里，它的“乌尔都语化”现象十分严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旁遮普省政府将乌尔都语定为该省的官方语言，但旁遮普语却在旁遮普人的保护下维持住了自身地位：该省的广播、电视均设有旁遮普语节目，报社专门发行旁遮普语报刊，一些乌尔都语报刊还设有旁遮普文学专栏，在省会拉合尔设有旁遮普语学会，专门出版旁遮普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族裔民族主义所采纳的民族概念主要是基于文化和血缘的，因而其独立前的政治目标是追求从一个更大的政治单元中分离出来或在特定的民族祖地上重新聚集。历史上，俾路支人所建立的卡拉特汗国是被英国殖民者强行纳入南亚次大陆殖民体系而成为卡拉特土邦的。英国殖民者将诸多分布零散、距离遥远的民族置于一个政权之下，这既扩大了其政治活动的规模，也增加了不同民族间因中央配置资源不公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在南亚次大陆去殖民化的过程中，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衰落和政权移交的趋势愈发明显，俾路支民族主义便开始对未来后殖民国家的秩序及其公民化的民族认同发起了挑战。尽管卡拉特土邦在武力威慑下最终选择加入巴基斯坦，但俾路支人却因此遭受了强烈的心理冲击。他们普遍认为曾盛极一时的卡拉特汗国终结在了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手中，这对长期坚持俾路支斯坦统一理想的俾路支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侮辱。^①这种耻辱感令大部分俾路支人对巴基斯坦缺乏国家认同，对巴联邦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对构成军队主体的旁遮普人心怀不满甚至敌意。这些族裔民族主义所激发的民族情感与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矛盾频繁互动，在巴联邦政府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失当时互相激化，为俾路支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埋下了伏笔。

（二）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诱因

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诱因比较复杂，总的来说可归结为相互矛盾的政治制度、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和相对独立的文化等三个方面。

^① 张元：《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5页。

1. 相互矛盾的政治制度

俾路支人普遍感觉俾路支省只是名义上巴基斯坦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一块听任国家摆布的自然资源输出地，俾路支人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无力决定事关俾路支省发展的决策。俾路支人在国家机关和军队中代表权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巴基斯坦联邦议会、政府和军队中，俾路支人的任职数量很少，且基本处于从属地位，缺乏话语权。例如：1947~1977年，在179位联邦政府内阁成员中，只有4名俾路支人；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军官中，俾路支人与信德人合计仅占5%。^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巴基斯坦的国家结构、政治体制与政治运行机制之间存在矛盾。

虽然巴基斯坦的国家结构是联邦制，但政治运行机制却表现出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征。巴基斯坦建国以来，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民选政府，执政期间都未真正遵守相互协商、权力下放、地方自治等联邦主义的基本原则。以立法权为例：巴基斯坦联邦议会独享的立法权远大于与省议会共享的立法权，当地法律与联邦法律相矛盾时，无论立法时间先后，地方法律都必须服从联邦法律。^②这对缺乏国家认同且不信任联邦政府的俾路支人来说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中央利用了其在立法权上的至高地位打压地方自治，故而不断要求联邦议会更多立法权下放，甚至各省独享立法权。在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俾路支省与联邦间的矛盾便更深了，俾路支民族主义思想亦随之深化。

与中央集权相伴而生的是一族主导的政治格局。巴基斯坦的政体是议会制，但在运行过程中却一直为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和部落血缘关系的家族政治所左右，具有明显的“自私性”和“地方性”特点。^③家族政治与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结合使巴基斯坦政党具有地域化、族群化特征，省际边界基本上就是族群和政党的分界线，几个全国性政党分别是不同族群的代表，如穆盟（谢里夫派）代表旁遮普人，人民党代表信德人，正义运动党代表普什图人，唯独俾路支人没有全国性政党。^④这些政党在职务任命、政策制定、公共福利等方面向本地域和本民

^①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Balochis of Pakistan: On the Margins of History*,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6, p. 51.

^② 何演、黄瑶：《巴基斯坦政治体制对中亚经济走廊的影响》，高柏、甄志宏等编：《中亚经济走廊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8页。

^③ 王旭：《中亚经济走廊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郭亚洲主编：《“一带一路”跨境通道建设研究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0页。

^④ 钟智翔、孔亮：《中亚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巴基斯坦文化挑战》，《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46页。

族倾斜，导致了政党与选民之间规律性的投票模式和稳定的政治认同。^①与此同时，人口是巴基斯坦政治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无论是政治权力分配，还是财政资源分配，都离不开这一衡量标准，这对地广人稀但资源丰富的俾路支省来说是极为不利的。由于旁遮普人拥有人口上的绝对优势，巴基斯坦政坛呈现出“旁遮普一族主导”的格局。旁遮普人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拥有最大话语权，国家的各类资源就向旁遮普省倾斜。其他省份，特别是俾路支省，对此严重不满，省际不和、民族矛盾等问题因而尖锐起来。

表 1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席分配情况^②

	直选席位	女性保留席位	非穆斯林保留席位	总计
旁遮普省	141	32	—	173
信德省	61	14	—	75
开普省	45	10	—	55
俾路支省	16	4	—	20
伊斯兰堡首都区	3	—	—	3
分类合计	266	60	10	336

数据来源：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网站 <http://www.na.gov.pk/en/composition.php>。

以中央集权和一族主导为特点的政治运行机制使联邦主义原则成为空谈。人口劣势导致中央政治机构中俾路支代表性不足，俾路支人的权利缺乏保障，进而深化了俾路支省与联邦政府间的信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俾路支人开始利用民族主义运动来寻求更多自主权。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乘势崛起并呈现出“民族利己主义”的极端化倾向。

2. 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

俾路支省矿产资源丰富，储量约占全国的50%，其中，铜金矿、铁矿石、大理石、重晶石、铬铁矿等储量较大，铜矿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80%以上。省内的苏伊气田是巴基斯坦最大的天然气田，天然气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50%。另一方面，俾路支省战略位置突出，位于莫克兰海岸的瓜达尔港是天然的深水良港，靠

^① 李厚蕾：《当前巴基斯坦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其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8年第3期，第161页。

^② 2018年5月24日，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第31号修正案》，决定将FATA并入开伯尔普什图省（开普省）；5月31日，时任总统的马姆努恩·侯赛因批准了此次修订，标志着“联邦直辖区”在法律意义上正式成为开普省的一部分。因此，表中属于“联邦直辖区”的议席在法理上已经归属开普省。考虑到该表中的数据源于巴基斯坦国民议会的官方网站，笔者尊重巴基斯坦官方表述，仍将“联邦直辖区”的议席单列。

近霍尔木兹海峡,扼守波斯湾。然而,俾路支省又是巴基斯坦最贫穷的省份,其工业基础薄弱,几乎没什么大型制造业,除工艺品生产颇具规模外,其他制造业在全国所占比重很小。自20世纪70年代起,巴基斯坦联邦政府逐步加强了对俾路支省的经济开发,制定并实施了多项经济开发倡议,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力度,使俾路支省的各项经济指标有了明显提升,但还是无力改变俾路支省社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事实。

长期以来,俾路支省的经济发展水平都是巴基斯坦各省中最差的。从1972/73财年到2004/05财年,俾路支省的经济增长了2.7倍,而同期西北边境省(今开普省)和信德省的经济增长了3.6倍,旁遮普省增长了4倍;2004年,俾路支省的人均年收入仅为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①此外,俾路支省的城镇化水平也落后于其他省份。可以说,俾路支省的地缘优势和资源禀赋没能有效转化为经济发展机遇,以至于社会经济水平不仅全面落后于其他省份,而且差距越来越大。

2013/14财年,俾路支省学龄儿童的失学率为51%,旁遮普省、信德省和开普省的这一数据分别为27%、44%和32%;2018/19财年,俾路支省的该项数据增至59%,而其他三省的数据分别降至21%、42%和28%。2018/19财年,在电脑、手机和互联网的家庭普及率方面,俾路支省排名垫底,三项数据依次为6%、92%和19%,而巴基斯坦全国的平均数据分别为14%、95%和34%。^②俾路支省在信息技术设备上的落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信息时代,这种落后面貌无疑从源头限制了俾路支年轻人的发展机遇,破坏了起点公平。类似情况还有很多,遍及医疗、住房、饮水供给、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等重要民生领域。

日益扩大的社会经济差距导致俾路支人产生了不平等心理。这种不平等可以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该理论强调,挫折感和相对剥夺感能够促进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③一般来说,拥有封闭性、自主性社会的非主体民族被吸收进更大的社会中时,会成为其边缘族群,而主体民族则处于该社会的中心。中心与边缘在经济地位上是相对不平等的,客观上容易使非主体民族滋生不满情绪,进而诱发民族主义向民族分离主义方向发展。

对俾路支人而言,基本生活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境况令其产生了挫折感,而其他省份,特别是旁遮普省的社会经济水平,进一步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再

^① World Bank, "From Periphery to Core," *Pakistan Balochistan Economic Report* (May 2008), p. 8.

^② Pakistan Bureau of Statis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Pakistan Social &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2018-19 National/Provincial (Social Report)* (June 2020), p. 18, p. 61.

^③ 刘泓等:《当代国外民族分离主义与反分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0页。

加上俾路支人不满旁遮普人主导联邦政府和军队，便使他们将自身的糟糕境遇归咎于旁遮普人。俾路支人普遍认为，旁遮普人主导的联邦政府通过所谓的“经济开发”，掠夺了俾路支省的自然资源，抢走了本该属于俾路支人的发展机遇和资源红利，导致俾路支省社会经济水平长期落后。以天然气开采和使用为例：尽管俾路支省坐拥巴基斯坦最大气田——苏伊气田和第三大气田——拜尔古赫气田，但全省30个县中只有4个县通了天然气，83%的天然气被输送到了旁遮普省，而只有12.5%的燃气使用费归俾路支省所得；德拉·布格迪县是苏伊气田的所在地，可2011年该县的人类发展指数竟然排在全国所有县的最后一位。^①此外，经济开发活动吸引旁遮普人、信德人、普什图人等民族来到俾路支省。这些人一方面在就业市场上挤压了俾路支人的空间，另一方面改变了俾路支省的人口结构，加剧了俾路支人对“内部殖民”的担忧，进一步刺激了其民族主义情绪，使之呈现出“民族排外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等极端化倾向。

3. 相对独立的文化

当代巴基斯坦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多个民族，他们的社会生活形态不同，风俗习惯各异，所操语言有别，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与此同时，巴基斯坦又是单一文化论的产物，其立国基础是“两个民族”理论。该理论从习俗、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出发，区分了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具有明显的宗教民族主义特征。因此，巴基斯坦的建立是为了满足次大陆穆斯林保护自身文化类型的需求。在伊斯兰文化共性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巴基斯坦各民族的文化个性则凸显了出来。

俾路支文化和习俗本身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俾路支人将文化起源追溯到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本族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并保持着独特的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俾路支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南亚伊斯兰文化框架下的“亚文化民族主义”。所谓亚文化民族主义，是指由于历史原因，国家中的某些民族在语言、文化或地理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会有追求政治独立的愿望和努力。在较温和的形式下，这样的民族会以更大程度的自治为目标，而在较激进的情况下，则会表现为旨在建立新国家的分离主义运动。^②

在当代巴基斯坦，俾路支人的文化独立性主要体现在“萨达尔”制度上。“萨达尔”是俾路支部落首领的称号，指“比旁人更聪明、更勇敢、熟知部落传

^① Rabia Aslam, "Greed, Creed and Governance in Civil Conflicts: A Case Study of Balochistan,"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Vol. 19, No. 2 (June 2011), p. 197.

^② 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

统并身体力行之人”。^①萨达尔大多阅历丰富、威望颇高，他们的意见在部落中很有分量，是部落民立身行事的重要依据。起初，萨达尔是由部落民依据个人功绩和能力选举产生的，后来随着其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巩固，逐步变成了世袭制。英殖民者入侵卡拉特汗国后，为了有效控制俾路支部落局势，先是采取了“闭关”政策，隔离了部落区，但效果并不明显；之后，英殖民者改变策略，采取了“和平渗透”政策，主要措施之一便是拉拢、扶植萨达尔，保持部落自治，间接控制部落。得到了英国人的政治与经济支持，萨达尔在部落中便享有了无限权力和至高权威，进而毫无顾忌地统治部落。在英印政府的授权下，萨达尔可以通过支尔格会议直接判定罪责并处理罪犯，甚至可以随意将部落民投入监狱。

巴基斯坦独立后，作为联邦政府与俾路支地方博弈的结果，部落自治模式和萨达尔制度得以长期保留，为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创造了良好条件。相较于巴基斯坦主流社会，自成体系的俾路支部落显得僵化、封闭。萨达尔为了维护自身地位和现有权力体系，不仅阻挠部落民与外界联系，而且不断强化部落民的集体主义观念、族裔认同和对萨达尔的经济依附关系，使之难以产生牢固的国家认同；与此同时，奉行“愚民”政策，抵制现代化，给俾路支部落民融入主流社会设置了障碍。萨达尔普遍反对在自己管理的地区开办学校，更有极端者反对给本地区通电。此外，为了抵制联邦政府对部落制度的改造，保住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一些萨达尔蓄意制造动荡，蛊惑俾路支部落民对抗联邦政府和旁遮普人，甚至不惜以“民族自决”“民族解放”为由，发动武装叛乱。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俾路支民族主义运动和武装叛乱的领导人都是萨达尔；一些要求更大“自治权”，甚至提出独立主张的民族主义政党，都与地方上的俾路支部落联系紧密。^②由此可见，萨达尔制度严重阻碍了俾路支部落民接受现代文化和政治制度，同时也给俾路支排外主义和俾路支分离主义提供了温床。

二、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影响

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主要表现为只顾本族利益而不顾其他民族利益的俾路支利己主义，拒绝一切外来民族和文化的俾路支排外主义，以及割断历史、文化联系，企图将俾路支省从巴基斯坦分离出去的俾路支分离主义。这三种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虽然并非因中巴经济走廊而产生或激化，但在实际中却给经济走廊建

^① 阿不杜拉·江·贾玛尔迪尼著，陆水林译：《俾路支斯坦萨达尔制度的历史背景》，《南亚研究季刊》，2005年第1期，第72页。

^② 王晋：《民族、族群、国家理论与俾路支民族主义》，《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年第1期，第153~154页。

设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值得警惕。

（一）俾路支利己主义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

受俾路支利己主义影响的政党、团体一味追求俾路支人利益的最大化，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经常违背国家整体逻辑行事，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正常进行。基于对巴基斯坦政府和旁遮普人的不信任感，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对中巴经济走廊抱有矛盾态度。一方面，民族主义政党希望经济走廊能给俾路支人带来就业机会和经济活力；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经济走廊建设会带来资源流失、经济利益受损、公平性缺失等等负面效应。

最初，俾路支人主要担心的是俾路支省所在的西部地区在中巴经济走廊规划中被刻意忽略。早在2015年，时任俾路支省首席部长的民族党（National Party）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无论是瓜达尔港还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公路，都必须使俾路支人首先获益，否则俾路支人不会支持相关开发项目……”他还表示自己并不信任中巴经济走廊，对其路线设置毫不知情。^①俾路支省议会的很多议员则认为联邦政府修改了瓜达尔到喀什的原始路线，故意绕开了俾路支省，为此他们威胁要在伊斯兰堡举行无限期静坐活动，以抗议联邦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在这种形势下，联邦政府不得不于2015年5月召开了两次全政党会议来协调各方立场。最终，政府决定设置东、中、西三线并承诺首先完成西线建设。即便如此，围绕经济走廊线路的争议也没有结束。从铁路规划到公路规模，从融资渠道到建设进度，凡是与计划、承诺有出入的事项都成了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质疑经济走廊公平性的理由。2016年9月，俾路支民族党（Balochistan National Party）主席阿赫塔尔·门加尔在一次集会上表示，巴基斯坦的统治者对俾路支省的发展毫无兴趣，中巴经济走廊会剥夺较小省份的权益，俾路支人不接受基于欺诈的发展。^②甚至连俾路支省议会都指责联邦政府剥夺了俾路支省在中巴经济走廊中的应得份额，并通过决议，要求成立由每个省各派两名代表组成的国家委员会来审查经济走廊项目分布不公的问题。^③来自俾路支民族党的议员萨纳乌拉声称，经济走廊99%的投资流向了东线，俾路支省遭到了忽视。^④

^① Safdar Sial & Peer Muhammad, "A Review of Developments on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Vol. 7, No. 2 (September 2015), p. 170.

^② Abdul Wahid Shahwani, "Mengal likens CPEC to Kalabagh dam," September 5, 2016, <https://www.dawn.com/news/1282166>.

^③ Saleem Shahid, "Balochistan MPAs demand 'due share' in CPEC projects," December 22, 2018, <https://www.dawn.com/news/1452914/balochistan-mpas-demand-due-share-in-cpec-projects>.

^④ Syed Ali Shah, "Balochistan Assembly adopts resolution against meagre provincial share in CPEC," December 21, 2018, <https://www.dawn.com/news/1452812>.

然而，随着经济走廊建设逐步深入，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又开始对中国通过大型项目，如瓜达尔港开发和山达克铜矿开采等，参与俾路支省经济发展表示担忧。他们担心中巴经济走廊在俾路支省的项目并不能真正使俾路支人获益，反而造成本省资源流失。俾路支省前首席部长、民族党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总结了俾路支民族主义者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要求，其中有两点充分体现出了民族利己主义思想：1.瓜达尔港的控制权要交给俾路支省；2.中巴经济走廊在俾路支省创造的工作机会必须优先给俾路支人。^①

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坚持认为瓜达尔港首先属于俾路支省，其次才属于国家，瓜达尔港应该由俾路支省政府掌控。俾路支民族党在2018年的竞选宣言中写明，要捍卫俾路支人在中巴经济走廊上的合法权益，将采取措施使俾路支省政府获得瓜达尔港的控制权。^②党主席阿赫塔尔·门加尔也多次要求联邦政府把瓜达尔港的控制权移交给俾路支省。^③此外，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一直要求俾路支省政府掌控本地资源，获得资源开采收益，因而对资源方面的投资十分敏感。来自民族党的省议会议员阿克拉姆·达什提宣称，尽管中巴经济走廊的大部分投资发生在能源领域，但俾路支省得到的却微乎其微。^④该观点在俾路支民族主义者中很有市场，他们认为，虽然俾路支省有发电项目，但产出的大多数电力都进入了国家电网，无法满足本省需求。

在民族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将省内的资源和经济走廊项目视为民族私产，不顾经济走廊的整体性和宏观性，一味强调俾路支人的利益，在政策程序方面给经济走廊建设带来了阻力。此外，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忽视了经济走廊的长期效益，在短期收益不明显的情况下，频繁质疑经济走廊的公平性，不断借助媒体报道、议会提案、游行示威等手段向联邦政府施压，导致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相关政策前后矛盾或相对滞后，不仅耽误了经济走廊的建设进度，而且影响了中方投资者的热情。

（二）俾路支排外主义破坏中巴经济走廊的形象

随着早期收获项目的陆续竣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步入了第二阶段，在这一

^① Safdar Sial, *CPEC in Balochistan: Local concerns and implications*, Islamabad: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2019, p. 10.

^② Shahid Saleem, "BNP-Mengal vows to ensure people's rights in CPEC," July 2, 2018, <https://www.dawn.com/news/1417366>.

^③ Arif Rafiq, *The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Barriers and Impact*,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7, p. 38.

^④ Safdar Sial, *CPEC in Balochistan: Local concerns and implications*, Islamabad: 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 2019, p. 10.

阶段，两国企业将是主角，产业合作将以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为平台逐步展开。位于俾路支省的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项目合计有7个，^①二者皆建立在当地社会基础之上，需要充分的人力支持和友善的文化氛围。因此，中巴经济走廊在俾路支人心中的形象便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当地社会对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的参与程度，是经济走廊由“表层”走向“深层”的关键依靠。然而，俾路支人有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对涉及民族权益和尊严的问题十分敏感。^②俾路支排外主义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肆渲染经济开发的负面作用，对走廊进行“污名化”，激起了普通民众的排外情绪，破坏了经济走廊形象。

俾路支排外主义者对外族人怀有疑惧甚至敌视心态，盲目恐慌于外族人参与俾路支省的经济开发和利益分配。这里的外族人既包括国内其他民族的劳工，又包括外国投资商、技术专家和普通工作人员。

一方面，俾路支人担心随着瓜达尔港开发的深入，非俾路支人会占据更多土地，进而逐步改变瓜达尔地区乃至俾路支省的人口结构。受排外主义影响的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对大量外省工人参建瓜达尔港表示不满，认为外省工人不仅剥夺了俾路支人的工作机会，而且会使俾路支人成为少数族裔。因此，他们反对给外省工人提供本地长居证明，要求通过立法限制外省人的土地所有权和投票权。^③另一方面，人文交流与经济交往相伴而生，参建中巴经济走廊的人属于不同民族，各带文化特征，在增加俾路支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会对俾路支人的传统文化造成冲击。这对保守的俾路支部落首领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随着俾路支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俾路支省内已经出现了很多不依附于部落首领的中产阶级，游牧传统也逐渐被放弃，部落制度的根基产生了动摇。因此，以部落首领为代表的民族排外主义者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描述成了“文化入侵”行动。

部分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将矛头对准了参与俾路支省资源开发的中国企业。他们以山达克金铜矿为例，宣称中国企业从国内带来了大量从事技术工作的员工，却很少雇佣本地的俾路支人。尽管他们承认大多数俾路支人没有从业资格且缺乏专业培训，难以在短期内胜任，但还是质疑中国企业很少雇佣他们，反而从中国国内招工的做法。一些民族主义政治领袖对俾路支省的工业园区建设表示担忧。他们认为中国企业技术先进，生产的商品物美价廉，会蚕食当地市场，威

^① Mehmood Hussain & Sumara Mehmood, "Special Economic Zones (SEZs) and Industrial Parks (IPs) under CPE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Regional Studies*, Vol. 36, No. 2 (Spring-Summer 2018), p. 102.

^② 张元：《巴基斯坦俾路支分离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7页。

^③ 钟智翔、孔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面临的巴基斯坦文化挑战》，《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45页。

胁本土企业的生存。类似的负面宣传打击了俾路支人参与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不利于产业合作在俾路支省的开展。

俾路支排外主义者还将对旁遮普人的排斥和敌意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并将中巴经济走廊作为宣泄渠道。他们先验地把国家的各项政策预判为旁遮普人对俾路支人的侵犯和控制，报以防范、挑剔、抵制和反抗，^①进而污蔑走廊是旁遮普人攫取俾路支省资源、欺压俾路支人的工具。以瓜达尔港的收益分配为例，根据协议，中国将获得瓜达尔港收入的91%，巴联邦政府控制的港务局将获得其余的9%，为期40年。在此期间，俾路支省可通过国家财政委员会奖励的方式从收入分配池中获取一定份额，根据现有分配比例，旁遮普省获得51.74%，信德省获得24.55%，开普省获得14.62%，俾路支省获得9.09%。这种分配方式引发了俾路支排外主义者的不满，他们认为国家财政委员会由旁遮普人所把持，只照顾旁遮普省的利益，建设、开发瓜达尔港实际上成了旁遮普人“合法剥削”俾路支人的手段。类似指责还针对过共同利益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等与中巴经济走廊密切相关的独立委员会，原因皆是这些委员会充斥着旁遮普人，只代表旁遮普省的利益。

部分俾路支排外主义者甚至将“反中国”与“反旁遮普”等同而视，污蔑中国有殖民倾向，意图霸占瓜达尔港，掠夺俾路支省的资源，将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塑造成了“新殖民主义者”。他们表示，俾路支人在中资企业只能从事低端工作，会逐步沦为附庸，且中国人乐于建立自己的社区，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排斥融入本土社会。此外，排外主义者还极力渲染所谓的“过度安全化”问题，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给旁遮普人控制的联邦政府在俾路支省投入过多安保力量提供了借口，指责过于严厉的安保措施阻碍了贸易的正常开展，严重影响当地人的正常生活，有辱俾路支人的尊严，令其对民族故土产生了“异乡感”。类似的叙事无疑加剧了俾路支人对“被殖民”的恐惧，进一步降低了其参与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意愿，不利于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运营。

（三）俾路支分离主义威胁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

近年来，得益于强有力的反恐举措，巴基斯坦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恐怖袭击的数量和烈度下降明显。然而，在全国安全形势向好的情况下，俾路支省的安全问题却显得十分突出。

^① 钱雪梅：《巴基斯坦俾路支民族主义探析》，《世界民族》，2013年第3期，第30页。

表 2 2014 ~ 2019 年俾路支省恐怖袭击和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以及各自在全国所占比例

年份	恐怖袭击数量（起）及在全国所占比例	死亡人数（人）及在全国所占比例	受伤人数（人）及在全国所占比例
2014	341, 28%	375, 22%	926, 29%
2015	218, 35%	257, 24%	329, 23%
2016	151, 34%	412, 45%	702, 43%
2017	165, 45%	288, 35%	532, 31%
2018	115, 44%	354, 59%	589, 57%
2019	84, 37%	171, 48%	436, 60%

资料来源：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于2014~2019年发布的《巴基斯坦安全报告》。

目前，俾路支省内比较活跃的分离主义组织包括：俾路支解放军（Balochistan Liberation Army，简称“俾解”）、俾路支解放阵线（Balochistan Liberation Front，简称“解放阵线”）、俾路支共和军（Balochistan Republican Army）、俾路支共和卫队（Baloch Republican Guard）、俾路支斯坦军（Lashkar-e-Balochistan）、俾路支联合军（United Baloch Army）等等。

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一致反对中巴经济走廊，认为瓜达尔港项目损害了俾路支人的政治和财政自主权，将经济走廊视为掠夺俾路支省资源的阴谋。近年来，这类组织对中巴经济走廊发动了数次袭击。2018年8月11日，1辆载有18名中国工程师的长途汽车在由查盖县山达克矿区驶往达尔本丁的途中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包括3名中国人在内的5人受伤。^①事后，俾解宣称对该袭击负责。2019年5月11日，一伙俾解武装分子袭击了瓜达尔的明珠大陆酒店，导致2名保安死亡，2名保安受伤，俾解宣称袭击目标是入住酒店的中国投资者。^②更加值得警惕的是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的联合趋势和活动范围的扩大。2018年11月10日，“俾路支民族自由阵线”（Baloch Raji Aajoi Sangar, BRAS, 即“布拉斯”）正式宣布成立。“布拉斯”的主要目标是团结、整合民族力量使俾路支省脱离巴基斯坦，为此它将巴基斯坦军队和中巴经济走廊视为袭击目标。

除了在俾路支省内发动恐怖袭击外，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还将触手伸向了其他省份。2018年11月23日，3名俾解武装分子袭击了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并与当地警察交火，导致2名警察和2名巴基斯坦签证申请人死亡。巴政府认为，此次

^① Syed Ali Shah, “3 Chinese nationals among 5 injured in Dalbandin suicide attack,” August 11, 2018, <https://www.dawn.com/news/1426367>.

^② The Balochistan Post, “BLA’s Majeed Brigade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Gwadar hotel attack,” May 11, 2019, <https://thebalochistanpost.net/2019/05/blas-majeed-brigade-claims-responsibility-for-gwadar-hotel-attack>.

袭击旨在破坏中巴两国的战略贸易合作，恐吓中国投资者。^①2020年6月29日，4名俾路支武装分子袭击了位于卡拉奇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大楼，造成包括1名警察在内的5名安全人员死亡，另有多人受伤。^②需要注意的是，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巴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巴基斯坦哈比布银行组成的联合体于2017年1月收购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40%股权，其中中方3家交易所持股30%。由该事件可以看出，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已将与中国有直接联系的巴基斯坦机构和基础设施作为袭击目标，意在削弱巴基斯坦经济，影响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俾路支分离主义组织将与中巴经济走廊的相关人员、机构和设施作为袭击目标，以此作为打击巴基斯坦联邦政府、谋求俾路支省独立的手段，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了直接威胁，同时破坏了巴基斯坦的安全环境，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给走廊建设增加了难度。

三、结语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第一阶段以能源、基础设施和瓜达尔港为主。在这一阶段，俾路支省对经济走廊的参与度不高，获得的收益有限，这与省内民族主义政党的期望有较大差距，加之对旁遮普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导致俾路支民族主义政党频繁就经济走廊的公平性、透明性和负面效应等问题向巴基斯坦政府施压，干扰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的推进。同时，俾路支民众对外来者的疑惧心理容易被民族排外主义者利用，在“污名化”叙事的影响下演变成对经济走廊项目的排斥情绪，进而影响了走廊在俾路支省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最严峻的省份，省内恐怖组织多，且互有联系、相互支持，又与巴基斯坦政府矛盾极深，因而对中巴经济走廊构成安全威胁。随着早期收获项目陆续竣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向第二阶段迈进，参与走廊建设的中资企业、中方人员会更多。在俾路支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走廊在该省承受的安全压力会更大。

俾路支民族主义极端化问题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诱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中国应当在不干涉巴基斯坦内政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尽可能降低其对中巴经济走廊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李丽]

^① Anam Fatima, "CPEC Security in 2018," *Conflict and Peace Studies*, Vol. 11, No. 1 (January 2019), p. 117.

^② 丁雪真：“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发生恐怖袭击 5名安全人员死亡，”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0/0629/c1002-31763642.html>.